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创立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工人没有祖国”，但是工人“本身还是民族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1页）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揭示了工人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的一个基本特性——无产阶级的世界性、国际性蕴含在民族性之中，其国际性和民族性是辩证统一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这一基本特性，在思想上引申出一个理论原则，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同上，第285、248页）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一经落脚现实世界，成为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理论思想和行动纲领，就必须回答和解决当时当地的社会问题；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成功地实践着马克思主义，一定会给马克思主义增添新的语言、新的内容，为实践着的马克思主义带来了民族风格。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质，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解决本国的实际问题，首先使本民族的无产阶级事业取得胜利的发展。无疑，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胜利，是把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运用于俄国社会实践而产生的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列宁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把马克思主义俄国民族化的第一个成功的范例和第一次成功的回答。1920年，列宁阐明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在理论与实践之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方面取得的一些基本认识和基本经验：“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在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之前虽然都要预先经过本质上相同的锻炼，但这一发展过程又是按各自的方式来完成的。”“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在每个国家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完成统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199、200页），等等。

列宁在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成就十月革命的同时，敏锐地觉察到“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的发源地已在亚洲出现”、“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以及它们‘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提出了“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的判断。（《列宁选集》第2卷，第307、315、317页）十月革命后，列宁更是把民族殖民地问题作为未来世界革命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当作新建立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一项重大任务。列宁认为，这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已经面临和没有解决的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对亚洲民族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满怀希望。

列宁的远见在中国得到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成功地运用于中国社会实践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是继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之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化的又一个成功的范例和成功的回答。

二、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列宁及其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开通了世界历史前进的道路，但是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即民族化的口号的，是其后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那么，毛泽东为什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呢？又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呢？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中国先进分子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握了西欧第二国际破产的教训，吸取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经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接受的是共产国际的指导。因此，实现从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过渡到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相互关系的重大问题，更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是：怎样结合中国的国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把十月革命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成功经验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独立指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和政策。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怎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上，有着这样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教条主义的态度，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时往往只注重结论，忽视了引出结论的具体事物的背景和过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明确指出，他们关于“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76页）。在教条主义式的思维和活动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那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积极、主动、灵活的思想方法被忽略了，往往不能把读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上级的指示与当前的革命斗争、社会生活很好地结合起来。

对于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发生的这种理论与实践脱离的现象，毛泽东是认识最早最深刻的人。1930年，他在《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形象而生动地分析了这种现象的心态和做法：“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1、116页）

那个时代，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有两个紧密结合的特点，一是思想上的懒汉，不勤于思索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二是组织上的依赖性。这样的问题，若发生在基层，一般来说影响或危害还不算太大；若发生在中央和决策机关，影响和危害就是全局性的。

毛泽东所揭示的“本本主义”的现象，不仅描述了那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揭示了那时革命发生挫折的基本原因。毛泽东响亮地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口号（同上，第111、115页），提醒和告诫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同志们，要自己调查周边的敌我双方的情况，主动出击，创造性地做好自己的各项工作，不要因为消极等待上级或远方的指示，而丧失根据地发展的大好时机（当时国内正值军阀混战）。

鲜明地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口号，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自觉地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体现着一种深邃的理论思维的觉醒，是马克思主义走向中国化的重大突破。

与教条主义的态度相反，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注重多思多问，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究竟是谁？这个革命的任务究竟是什么？这个革命的动力是什么？这个革命的性质是什么？这个革命的前途又是什么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2-633页）等一系列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在总结学习马列主义的经验时说：“马列主义的方法有三条，一是理论同实际相联系，二是反对自发论，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75页）

毛泽东是怎样看待理论联系实际的呢？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往往是一个艰苦的、长期的过程。如果以为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认真读书，冥思苦想；或者下到基层，短则七八天，长则个把月，搞出个调研报告，就算是理论联系实际了，这是远远不够的，有的甚至是自欺欺人。毛泽东批评了这两种做法。对于前者，毛泽东说：“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对于后者，毛泽东说：“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1页）

毛泽东的理论联系实际是从社会调查入手，但是他的做法与众不同。首先是时间长。就拿调查农村问题来说吧，毛泽东不是只调查一时一事，而是调查了一生。从1927年上井冈山到1945年去重庆谈判，仅这段时间，靠两条腿，从南走到北，在十几个省的农村一住，工作加生活，就是整整18年啊！在毛泽东看来，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关系中关系重大，要真正彻底了解农民，了解农村，与农民打成一片，使农民相信和依靠中国共产党，绝非一朝一夕、三年五载所能做到的。在中国共产党里，毛泽东首先认识到，“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说，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1-792页）毛泽东总结出一种富有成效的学习方法：“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1页）不是别的人而是毛泽东提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一个原理：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参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67页）

同样是做社会调查，毛泽东与他批评的“钦差大臣”不同在哪里呢？——在鲜明的立场，在坚定而明确的出发点，即毛泽东始终坚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脚踏实地，走出了一条群众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是毛泽东首先倡导并毕生实践着这样一种群众观点：“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0页）毛泽东以生动通俗的话语，点明了“群众”的重要性，点明了“知识”的源泉这样一些平凡而伟大的道理，这些话语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样勇于自我批评又诲人不倦的话，是毛泽东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写照。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出发点，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结论才是准确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才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因而在实践中才是可行的、成功的。所以说，在中国共产党内，是毛泽东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毛泽东刻苦学习马列主义，为后来系统地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由于毛泽东在社会实践和理论研

究两个方面有扎实而雄厚的功底，从而在运用十月革命的经验于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个重大问题上了，提出了新的系统的理论思想。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进而一步一步解决整个中国的革命与建设的问题。可是在有教条主义思想的同志那里，对这样一条中国革命的逻辑觉得不可思议，说什么“列宁没有讲过”（《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74页）！在他们的思想里，“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4页）。毛泽东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和十月革命的经验，经过加工提炼而中国化了。

教条主义既可能以“左”的形式表现出来，又可能以右的形式表现出来。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王明的先是“左”倾机会主义后来又又是右倾机会主义，无不以刻板地套用马克思主义或外国的历史为思想的出发点。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右倾机会主义给革命带来的失败，经历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的蓬勃发展，经历了“左”倾机会主义指导而遭受的巨大挫折，经历了抗日战争初期右倾机会主义干扰的局部损失，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全党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从中国革命的战略、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等若干方面，开始全面而深入地检查教条主义的错误。在这样的时候，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思想：“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成熟了。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其中经历了从反对教条主义发展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历史实践。只有通过一个一个具体的事例，透视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一个具体问题，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是怎样被中国化的。

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与与时俱进的伟大历史结果，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因为毛泽东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前进到社会主义革命，回答和解决了关于中国和世界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格局发生了直接的、深远的影响，从而成为继列宁主义之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毛泽东思想在哪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和解决了哪些重大问题呢？以下几个主要的方面是应该注意的。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学说。

这个学说有两个基本内容。一个内容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即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但是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是由中国无产阶级即中国共产党团结和领导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层来完成，是一种新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其历史结果和发展前途，不是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而是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另一个内容是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建立广大的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

（二）关于革命的政策和策略。

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5-606页）它们是三位一体的，但每一个又有非常丰富而独特的内容。它们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意义，超出了中国的范围。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方面，毛泽东明确提出并解决了如何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即“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页），也是进行宏伟的人民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49页）实行积极的政治思想工作，是毛泽东思想的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显著特征。因此，主动地对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是党的建设的主题。

总结丰富的军事斗争实践和经验，创造了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从创建人民军队到开辟政治上经济上独立而发展的根据地，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到现代化的国防建设这样一个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

毛泽东思想的统一战线的经验和理论最丰富，最生动。基本思想是，在革命和建设中都要实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对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页）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必须头脑清醒。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另一方面，则要坚决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等同起来，要重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警惕国内外资产阶级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极力消灭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防止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防止革命和建设的果实都归于资产阶级。（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7-608页）

（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基本内容有：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学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四个现代化学说，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防止和平演变的学说，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的学说。

（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怎么分析问题，怎么做农民、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怎么发动群众，怎么打仗，乃至怎么开会，怎么搞调查，怎么起草文件，怎么写文章，等等，这些又大又小的工作，非常具体，非常细致。“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9页）毛泽东在这方面做了深入的开拓，提出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等。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提出的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仍然是人们判断政治思想大是大非的标准。毛泽东在65岁的年龄，还亲笔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毛泽东思想工作方法的 basic 特点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从群众来，到群众去”。毛泽东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9页），倡导并实践“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第642页）的思想。这使得马克思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更贴近了，更生活化，更群众化了。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人类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原因是什么呢？就在于其立场和价值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毛泽东写了《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这样划时代的文章，重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念和人生追求。“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已经作为一种人生的道德情操和价值判断，成为现代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核心，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成为全体中国人民判断历史是非和检验工作结果的准绳。“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特征。

四、沿着毛泽东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前进

毛泽东在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每走一步都经历过战斗。

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披荆斩棘，才使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中国化，结晶为毛泽东思想，哺育出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集中了中华民族全部智慧和优秀品格，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武器和行动指南。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胜利，也是中华民族和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胜利。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观察社会、观察世界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是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武器，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历史的结论，历经千难万险，得到中国人民和世界的承认。

在我们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回顾毛泽东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时，更深切地感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巨大而深远。“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开启了“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的新时代（《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6页）。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今后的实践中将更加充分地显示其伟大的价值。

毛泽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没有结束，后面的征途依然任重而道远。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毛泽东提出了有待后人解决的问题。一个是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问题。毛泽东提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有这样“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9页）另一个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在经历了中苏论战和之后的苏东剧变之后，这个问题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

凡对人类进步做出过伟大贡献的思想，都蕴含着无穷的生命力。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8、172页）

参考文献

《邓小平文选》，1983年，人民出版社。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92年，人民出版社。

《列宁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文集》，1996年，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选集》，1991年，人民出版社。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

责任编辑：刘奔(《哲学研究》2003年第11期)